



露天喝坝坝茶，一可四处打望，二可高声喧哗，三可敞开豪饮，氛围轻松热闹——

# 重庆人的坝坝茶 摆不完的快乐龙门阵

□李正权

我不知道怎么来定义坝坝茶。坝本是平地，但坝坝却不一定就是平地，马路边、码头上、房前屋角，甚至一坡石梯一道堡坎，只要是露天的地方，似乎都可以作为坝坝茶中的“坝坝”。

坝坝茶就是在露天的坝坝里喝茶，一是可以抬头看天，二是可以四处打望，三是可以高声喧哗，四是可以敞开豪饮，精神放松，氛围热闹。春秋二季可以闻闻花香、听听鸟语；盛夏时躲在黄葛树下喝茶，有微风拂过，比坐在茶馆里舒服。特别是冬天，有那么一点点太阳，晒着太阳喝坝坝茶，是重庆人的享受。重庆俗话说“晒太阳过冬”，重庆山歌唱“太阳出来喜洋洋”。即使太阳没有什么温度，隐在雾中像个红不红黄不黄的烧饼，那一个个坝坝茶铺却客满为患。



## 重庆人生性爱喝坝坝茶

重庆的坝坝茶有两种，一种是茶馆面积有限，只好将茶碗端到坝坝来，可谓“天生”的坝坝茶；另一种是茶馆里装修华丽，设施齐全，茶室几乎全都空着，茶客们却偏偏要把茶碗端到坝坝来喝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茶钱反正都一样，并不因为在坝坝喝茶就会少一分一厘。在重庆，再好的茶馆茶楼如果没有一个露天的坝坝，生意就要大受影响。

自古以来，茶都是高雅之物，讲究一个“品”字。要“品”，环境就要清静，或在书房雅室，或在亭榭高阁，或在溪侧花圃，或在山野梅林。

有人说，重庆人喜欢坝坝茶，可能是文化层次低的原因。可是，偏偏是那些有文化的人，特别是作家、诗人之类的，最喜欢坝坝茶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重庆一批老作家、老诗人，如聂云岚、杨本泉、余薇野等人，每周都要聚会，每次聚会就是喝坝坝茶，一般都去人民公园露天茶馆，我曾参加过，不过我只喝“玻璃”（白开水）。

如今，若要找曾宪国、许大立、李钢等重庆一众作家诗人，那就去通远门城楼，他们隔几天就要在那儿喝坝坝茶。在重庆，越是人多嘈杂的处所，喝坝坝茶的人越多，这与古人“品茶”已经大异其趣。



## 很多坝坝茶开在繁华地

重庆喝坝坝茶的地方多，很多都在热闹繁华之地。十八梯里有，山城巷里有，东华观藏书楼重修后也成了喝坝坝茶的好去处。20多年前，磁器口还没有如今这样红火，最吸引人的不是陈麻花，不是毛血旺，而是嘉陵江边河沙坝的坝坝茶。我一个远房侄儿是磁器口的原住民，下了岗，就开了一个坝坝茶馆，维持了几年生活，直到退休。磁器口红火后，外地人涌入，那些坝坝茶馆才开始衰落，经过逐渐淘汰，如今已没了踪影。

外地人弄不懂坝坝茶的意味，也不喝坝坝茶，专供外地人游玩的地方往往没有坝坝茶。近年来，随着城市的改造，能摆坝坝茶的地方越来越少。除了公园之类的公共场所，只有躲进小街陋巷。夏季退水月份，江北金沙滩上也有人摆坝坝茶。据我所知，作家曾宪国是最喜欢喝坝坝茶的，只要听说哪儿新开了一家坝坝茶，他一定会去找，会去喝。光喝还不行，还要

在微信上晒几张照片，透露出深深的得意来。他写的那几部小说中，都能找出好多关于坝坝茶的故事。重庆主城喝坝坝茶的地方，他都光顾过。说起坝坝茶，他的两眼会放光。



## 喝坝坝茶不讲过场和客套

重庆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一直是军事重镇。开埠后，重庆得以快速发展，底子里是一个工商业城市。重庆底层市民没有那么多讲究，体现在喝茶上，也不讲什么过场，不夹斯文客套，显示出粗犷、实用、平民化的风格。过去，重庆人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泡茶，而且是用大盅盅泡，就是那种特大号的瓷杯子，一盅盅至少能装1500毫升水。重庆夏季炎热，动辄一身大汗，需要补充水分，喝茶不仅仅是为了提神。如果不海饮，一点一点地品，浪费时间不说，还让人更感口渴难忍。重庆冬天阴冷，没有暖气，一般情况下又不烤火，往往需要喝热茶来御寒。

重庆人性急，喜欢强烈刺激。重庆人喜好沱茶，就因为它泡出来特别酽，味道特别浓，刺激性也就特别强烈。海饮一番，让浓烈的苦味刺激口舌鼻喉，感觉特别舒服。重庆人还喜欢老荫茶、苦丁茶，富人穷人、官人百姓、下力人文化人都喝。与北京、上海和成都人比，重庆人对身份和地位看得淡多了。



## 轻松的氛围肆意的欢乐

在茶馆或茶楼喝茶，往往要分个上座下座什么的，不停礼让，浪费时间和表情，让人心底里讨厌。重庆人喝坝坝茶，一不看身份，二不讲地位，邀约几个亲朋，随随便便坐在坝子里，茶碗茶杯甚至就放在地上。一伙人边喝茶边摆“龙门阵”。摆着摆着，吹着吹着，一句话没有说通，就会争论起来。一争论，嗓门就开始放大，声音逐渐尖刻，于是就开吵架，甚至站了起来，还做出要打架的样儿。这时，就会有人出来说：“你两个喉咙都吼干了，喝口水嘛！”于是又坐下。当茶水润湿了情绪，争论也就结束了。

这边刚刚结束，那边又开始吵闹。即使没有争论，没有吵闹，喝坝坝茶的人东张西望，看到好玩的好耍的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旁边的人跟着瞄一眼，大家有所意会，于是一桌人一阵哄堂大笑。想想，关在茶楼的茶室里，哪有这样的乐趣？重庆人之所以喜欢坝坝茶，喜欢的就是这种轻松随意的氛围，喜欢这种肆意的欢乐。（作者系重庆市公安局退休工人）

# 江津古时为啥 号称“难治”？

□谭云籍 谭恒君

读各地《县志》，如果不了解历史，对许多说法一知半解，就很难明白具体含义。

比如，曾受一主编的乾隆版《江津县志》，收录了一篇南宋冉木县长写的《心舟亭记》，内有：“素号‘难治’。期会之纷，簿书之烦，舞文弄法之扰，政强梗不率之慢，令系人意者，日不知几？”这便是江津号称“难治”的来历。

清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，知县徐鼎重修《江津县志》，在《续修江津县志序》中再次提到：“津邑繁剧，素号称难治。”繁剧是什么意思？难治是什么意思？背后有没有特殊含义呢？这就需要了解清朝的官制体系，才能明白其专用指意。

清初，吏部为州县选官，采用月选掣签制，共有五个步骤：第一步，州县所缺官位，统一上报，吏部对报呈的官缺进行梳理分类，统计出每类的缺额数量；第二步，将官缺内容逐一写在竹签上，每签一缺；第三步，对竹签进行封固，看不到任何文字；第四步，将封固后的竹签放入签筒；第五步，每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外掣签。补缺官员，抽到哪个签，即补授某缺。

这是全天下最考手气的“赌局”，也是较为公正的行政管理体制。但这也带来了一个负面因素——抽中的人，不一定能抽到合适的州县。

清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广西布政司金鉉想出一个办法，便上书提议：按州县所在位置、管辖面积、治理难易等因素，将州县划为四等，然后根据补缺官员的才能情况，“许督抚量才奏补”。这样，督抚的权力虽然大了，可能涉及行贿受贿，但也提升了官员与州县的匹配度，提高了治理效率。“上嘉纳之”，“州县缺分四项自此始”。

这四等如何划分呢？先以“冲、繁、疲、难”四字为标准进行判断。地当孔道者为“冲”，即交通要道；政务纷者为“繁”，即事务太多；赋多拖欠者为“疲”，即经济困难，贫困地段；民刁俗悍、命盗案多者为“难”，即治安不好，犯罪频繁。

然后考察各州县各占多少字，再来定等级。一般情况下，凡四字俱有者为“最要缺”，占三字者为“要缺”，二字为“中缺”，只占一字或连一字也不占的为“简缺”。这便是州县的四个等级。以官之资历、能力对应“缺”之繁简，以官补“缺”，使官与缺相匹配。比如新官，从最好管理的“简缺”干起，能力强悍的官员去管理最难的“最要缺”州县。

从冉木的《心舟亭记》看江津的占字情况：一是约期聚集的事多（期会之纷）；二是官署中的文书簿册更是麻烦（簿书之烦）；三是经常受到歪曲法律条文，进行舞弊和徇私的行为干扰（舞文弄法之扰）；四是政务中经常遇到骄横跋扈，不服管教，傲慢无礼的事（政强梗不率之慢）。前两者，政事太多，应接不暇，可标以“繁”字。后两者，民风粗鄙，刁难行事，可标以“难”字。

江津管辖区域广，东西南北通畅，商贸较发达，自然事务繁多。山高林莽，易占山为王，加上地域群体性格耿直冲动，习武成风（江津是武术之乡），自然纠纷较多，易犯治安事件。

总体来说，古时江津县的工作量虽大，但管理的核心是治安问题，只能算“中缺”，普通官员即可。所以，江津虽号“难治”，其实不难。放在当时的官场来说，也算是肥缺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）

